

隋至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



卢 昉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摘要:十二生肖,或称十二(相)属,本是代替十二辰名称的十二种动物的总称。是古代占星家用十二种动物来记星象、记日、记年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用来表示人的生岁^{*}。我国的生肖俑起源较早,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早在公元六世纪的临淄北朝崔氏墓中就已出现动物形态的十二生肖俑^{**}。到隋唐时期渐成体系,在南方,尤以两湖一带为盛,一直延用到宋元时期,成为当时颇具地方特色的镇墓明器。高宗永徽(650年~655年)年后,中原也开始出现墓中放置成俑的十二生肖俑以作“压胜”、“辟邪”之用。

关键词: 南方; 十二生肖俑; 墓葬; 隋; 初唐

Abstract: The 12 animals were originally the collective name for 12 animals, which represent the 12 hours. Astrologists in the ancient times used the 12 animals to record the star signs, date and year; meanwhile they also used them to indicate the year of birth. Figures of the 12 animals appeared early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As early as in the 6th century D. C. appeared the 12 animal-shaped figures in the tombs of the family Cui, who lived in Linzi in the Bei Dynasty. The figures of the 12 animals became systematized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and continu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articles for daily use in tombs until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in souther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 Between year 650 and 655 D. C, the 12 animal-shaped figures started to appear the tombs in middle China, and were used to ward off evil spirits.

Key words: south; the 12 animal-shaped figures; tomb; Sui Dynasty; Early-period Tang Dynasty

墓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作为墓中压胜之物的生肖俑,无论是其发展、演变与衰亡,都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地方风俗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即从上述诸层面对隋及初唐南方墓葬中的生肖俑作一初步探讨。

一. 绪论

唐初,曾把全国划为十道,其中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五道统称为南方^①。但是,习惯上隋唐时期的南方,主要是指淮南和长江以南的一部分地区^②。然而,在墓葬中放置十二生肖俑的现象则多见于长江中游的两湖一带,这里所指的隋至初唐的南

方墓葬,就是指这一地区的墓葬。到目前为止,这片地区的隋唐墓葬资料已积累了一部分。现以该地区出土十二生肖俑的墓葬为例,将隋至初唐时期的十二生肖俑的形制与演变略加分析。

十二生肖古曰十二禽或十二属,是代表十二辰名称的十二种动物的总称。古人为了观星纪念,把周天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辰,每一个辰都有一种动物与之对应,即指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对应的十二种动物。合而谓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俑指代表十二辰的动物形象。除少数可以早到南北朝时期^③,多数是盛行

* 林梅村:《十二生肖源流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

**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于隋至唐代^④。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十二生肖与十二辰相配,最早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物势篇》。书中记载:“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马也。……酉、鸡也。卯、兔也。……申、猴也”^⑤。汉代蔡邕的《月令问答》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已确定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固定搭配。

至于十二生肖俑放置于墓坑中的记载则最早见于《唐会要》卷38中的记载[元和]六年十二月流条:“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九品以上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四神十二时各仪请不置”^⑥。在《宋史》卷124《礼志》27中,也明确记载着:“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入坟有当圻、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十二时神”^⑦。王援朝先生认为这与《唐会要》中的“十二时”是异名同物^⑧。

目前,关于墓葬中成俑的十二生肖的考古发现最早见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M10中。该墓中共出土十二生肖俑六件。皆为灰陶,带有龕台,计有虎、蛇、马、猴、狗以及生肖已失的龕台各一件。其大小近似,高21~23厘米。这座墓虽早期遭严重破坏,但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应该是较高的,据原作者分析,M10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六世纪前后。这有可能是十二生肖陶俑的最早实例。另外,偃师李元儼墓以及陕西刘家渠M1036全都在墓室东壁掏挖出小龕,估计也与存放生肖俑有关。

到了隋代,南方地区两湖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较成体系的十二生肖俑,而中原地区的墓葬最早出现十二辰是在墓志的四角上刻出十二神的形象。山西太原市发掘的北齐娄睿墓室壁画上栏一周有按正北为鼠、正东为兔顺序排列绘制的十二生肖图案^⑨。而成俑的出现在唐开元(713~741年)以前十分少见,唐开元28年(740年)的杨思勳墓以及天宝3年(744年)史思礼墓中出土有十二辰俑,均为兽首,身着交领宽袖大袍,立于圆形台座之上。

十二生肖俑的排列有严格的顺序,置于墓室四角,东南西北各三件,以鼠为始,顺时针方向布置。现今发掘的墓葬中多见生肖俑位置纷乱,这是后世的盗掘或自然淤灌的缘故^⑩。根据有关学者

的研究推测,中原地区的十二生肖俑很有可能是从南方传到北方地区的。南方的楚地,很有可能是这种神灵系统的发源地^⑪。

二. 生肖俑的分期与类型研究

两湖地区的隋唐墓葬虽然在形制上与北方和中原地区有较多区别,但是由于域内的大一统,南北方不断交流融合,南北艺术潮流尽管在观念与形制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毕竟是同一时代潮流的产物,因此也表现出许多共同的时代性特征。表现在墓葬中的随葬器物上,南北方就有了较多的统一之处。以陶俑为例,在南方隋唐墓中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仍是镇墓类俑,具有“压胜”之功用的十二生肖俑便是其中之一,它与双头蛇身兽、人面双翼俑等常见于两湖一带,形成该地区的一大特点。

就已知情况,生肖俑作陶或木所制的立体形象安置于特设的小龕之中,其最早之例是湖北武昌^⑫、湖南长沙^⑬、湘阴^⑭等地区发现的隋唐墓中的生肖俑为最早。在隋唐墓葬中,南方的隋朝墓沿袭南朝的系统,无论在墓葬形制和随葬明器方面都有地方特色。十二生肖俑开始普遍出现,初唐时逐渐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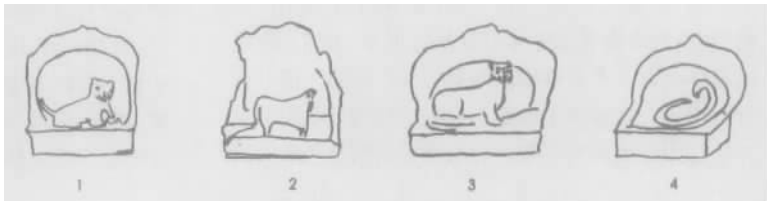
(一) 南北朝时期

该期出土生肖俑的墓葬目前发现的不多,笔者仅收录临淄北朝崔氏墓M10中出土的十二辰俑为例。

生肖俑共6件。分别为虎、蛇、马、狗等,以及已失生肖的小龕各一件。皆为泥质灰陶,且为动物原形,伏卧于龕台之内,龕台呈莲瓣状,有底座与背靠,背靠略向内凹,呈弧形,衬托出生肖俑形体,高度约在21~23厘米之间(图一)^⑮。据推测,该墓年代约在公元六世纪左右。

(二) 隋代

这个时期发现生肖俑的墓葬有三座。为兽首人身俑或文官俑手抱生肖或头顶生肖的形态。姿态以站立为主,顺时针子午向排列。由于俑的形态不同,可分为三型。



图一 临淄北朝崔氏墓M10出土的生肖俑

1. 虎 2. 马 3. 猴 4. 蛇

(引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图二 武汉市周家
大湾 241 号隋墓
土的生肖俑
(引用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武汉市郊周家大湾 241
号隋墓清理简报》,
《考古》1983 年第 9 期)

A 型, 1 座。生肖俑为头戴笼冠, 着宽袖衣衽大袍的坐姿文官俑。神态安详平和, 手抱生肖。以武汉市郊周家大湾 241 号隋墓为例。其年代在开皇至武德四年之间。生肖俑出土时只有 1 件在小龕内, 其余均在墓底部并且残缺。俑的形制和服饰大致相同, 陶色灰而带黄, 通高 29.8~37.5 厘米之间(图二)^⑩。

B 型, 1 座。为俑带生肖, 即十二生肖的后足踏在俑的双肩上, 前足擎在俑的帽檐上, 俑头戴高冠, 着对襟宽袖佛服微笑而盘坐。以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墓中的生肖为例, 出土时仅猴、狗生肖保存完整, 其它均已残, 通高 20 厘米(图三)^⑪。

C 型, 2 座。兽首人身生肖俑。着袍服, 双手置于腹前的坐姿俑。由于俑的烧造工艺、釉色以及服饰等

方面的差异, 可以分为两个亚型。

Ca 型, 1 座。俑的首部与身体分开烧造, 颈入俑身, 可以活动。以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墓中出土的另一套生肖俑为例, 除了狗、羊、鼠、牛、鸡、猴、兔保存完整, 其余均残, 俑表面施青釉且有脱落, 着右衽宽袖大袍, 通高 22 厘米(图四)^⑫。

Cb 型, 1 座。以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代 M29 出土的生肖俑为例, 共 12 件, 灰陶, 胎上涂粉后施朱红色, 色多脱落, 仅衣褶中稍有保留。着宽衣博带, 俑最高为 29.5 厘米, 底座最宽为 29.3 厘米(图五)^⑬。

(三) 初唐

这一时期的墓葬共有 5 座。生肖俑均为兽首人身, 着宽袖大袍, 姿态为跪或盘坐, 手持笏板抱于胸腹前作拱礼状。有的俑身下置底座。根据生肖俑手部的差异可分为两型。

A 型, 2 座。俑手持笏板抱于腹前。以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的生肖俑为例, 保存完整的为 10 件, 有鼠、虎、兔、龙、蛇、马、羊、猴、狗、猪的形象, 牛、鸡二俑已残缺。俑昂头平视, 着右衽宽袖大袍, 双膝盘坐, 俑下有底座, 神态安详端庄、富态丰腴, 通高 14~16 厘米(图六)^⑭。以及武昌东郊何家垅 188 号唐墓生肖俑(图七)^⑮。



图三 湖南湘阴县隋
大业六年墓
出土生肖俑
(引用熊传新:《湖南湘阴县
隋大业六年墓》,
《文物》1981 年第 4 期。)

图四 湖南湘阴县隋
大业墓中人身
生肖像

1. 鸡俑 2. 猴俑 3. 鼠俑
 4. 牛俑 5. 兔俑 6. 狗俑
 7. 羊俑
- (引用熊传新:《湖南湘阴县
隋大业六年墓》,
《文物》1981 年第 4 期)



图五 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 M29
出生肖俑(龙)

(引用武汉市文物管理会:《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图六 湖南长沙成嘉湖唐墓出土
兽首人身生肖俑(虎、猴)

(引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成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



图七 武昌东郊何家垅 188 号唐墓
出土的生肖俑

1. 蛇俑 2. 虎俑 3. 猪俑 4. 鸡俑

(引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武昌东郊何家垅 188 号唐墓出土
文物》,《文物》1957 年第 12 期)



图八 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的生肖俑

1. 鼠俑 2. 牛俑 3. 虎俑 4. 兔俑 5. 龙俑 6. 蛇俑 7. 马俑 8. 羊俑 9. 猴俑 10. 鸡俑 11. 狗俑 12. 猪俑
(引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 年第 12 期。)

B 型, 3 座。俑手部抱于胸腹前作拱礼状, 中留一可插物的方形或长方形小孔, 双膝就地作跪或盘坐状, 俑身下无底座, 兽首部分雕工细致, 形态逼真。根据俑坐姿、服饰的差异, 可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2 座。俑着宽边披胸大袖服, 上身挺直作长跪状。以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的生肖俑为例, 出土完整的生肖俑一套, 高 17 厘米左右(图八)②。

Bb 型, 1 座。俑着 V 字领博带宽袖佛服, 上身略向前倾, 双膝为盘坐状。以湖南湘阴唐墓中的生肖俑为例, 共出土生肖俑 12 件, 是一套完整的生肖俑。除兔、虎、龙三件已残外, 其余牛、鼠、蛇、马、羊、猴、鸡、狗、猪均完整, 通高 20~22 厘米(图九)③。

三. 关于生肖俑的演变规律

从南北朝最早出现生肖俑开始, 在山东临淄北



图九 湖南湘阴唐墓中的生肖俑

1. 鼠俑 2. 牛俑 3. 蛇俑
4. 马俑 5. 羊俑 6. 猴俑
7. 鸡俑 8. 狗俑 9. 猪俑
(引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朝崔氏 M10 中出土的生肖俑的造型仅仅是以动物原形的形式出现,伏卧于小龕内。雕刻手法自然古朴,形态写实逼真,却略显刻板,严肃有余,灵动不足。由于墓葬破坏比较严重,因此无法断定俑的排列摆放顺序。

到了隋朝,两湖地区的隋墓仍沿袭南朝的系统,但是生肖俑在形态上的变化极大,已经完全摆脱了之前自然古朴的动物形象,开始流行身着宽衣博带大袍,双手抱于胸腹前作拱礼状,正面盘坐,怀抱或头顶生肖的文官人物俑,并出现了兽首人身生肖俑,着宽袖大袍双手置于腹前。此时的雕刻工艺细致明快,形态庄重大方。排列摆放顺序为顺时针。兽首人身俑与唐代不同,兽首与身分开烧造而成,兽颈可插入俑身中并可活动。

初唐时期的生肖俑在两湖一带非常普遍。秦浩先生认为十二辰俑是唐初南方墓葬中最有地方特色的随葬明器^④。此时的生肖俑开始以兽首人身拱手持笏板的官员形象为主,还有的生肖俑手部抱于胸腹前作拱礼状,中间有可以插物的小孔,以坐姿为多,也有部分为站姿,俑身下时有方或圆形底座。这一时期的生肖俑形态华丽丰腴,显得大气雍容。排列顺序仍以顺时针方向旋转。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生肖俑的形态演变从出现到发展再到兴盛,都遵循着一个比较明显的规律,那就是“人气”化的加强。从最初的动物原形,到人持抱生肖,再到后来的人兽同体。人的作用、地位以及神的人化,都充分反映到了生肖的形态变迁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它的社会根

源在哪里?笔者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与相关的史书记载加以分析综合,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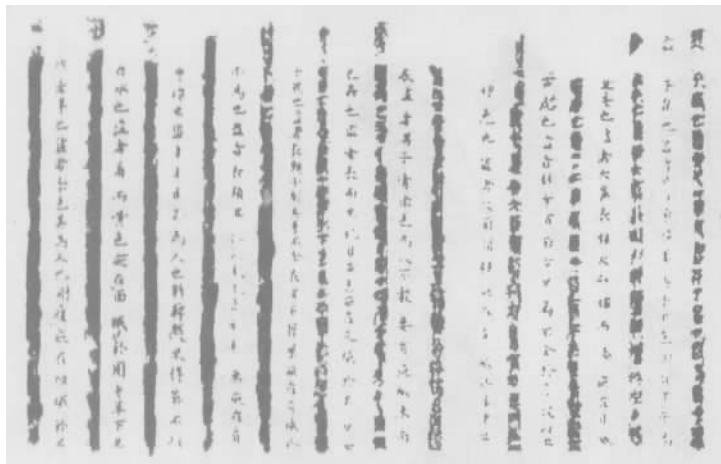
第一:人类历史上各文明都存在动物崇拜的阶段。从神话学意义上看,大致都有动物崇拜——人兽同体——神人同形的发展趋势。这一规律不仅局限于那些古代神化中的大量兽形、兽身人面神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向人形演变,同样对于镇墓俑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⑤。因此,被列为镇墓俑类的生肖俑也同样受到这种规律的制约。

第二: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纵观人类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人的自身地位就越高,人心向背的作用也越大。人自身地位的提高在唐代法律上有明显的反映。唐禁止掠夺买卖奴隶,“诸略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绞”^⑥。政治与法律是社会阶级关系的集中反映。隋唐时期在这方面的发展动向,表明了平民阶层的地位提高了。其抽象的表现就是对人自身、对人的权力与作用的历史地位更加重视了。

这些同样体现在整个文化的内容与精神中。柳宗元在其撰写的《天论》等多篇文章中,就曾全面的阐述了天与人的关系,并提出了“天与人相交胜”的命题,认为天不能干预人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胜天。据此可知,当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已经备受重视。在这种社会思想的影响之下,隋唐时期的生肖俑之形态逐渐由动物形象向人形发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四. 结论

(一) 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之说



图十 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竹简《日书》中记载的十二生肖
(引自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3期。)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的原始先民独立创造而非由外国传入的。1989年,盖山林公布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发现十二生肖岩画^②,由此可推断乌兰察布流行十二生肖之俗,均在汉代前后^③。李学勤先生在《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一文中指出,十二生肖的说法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④。此观点在学术界基本上已不存在异意。但是,关于十二生肖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却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其一:是源于东方的占星之术和古代阴阳历术。1990年,林梅村先生在《十二生肖源流考》一文中指出,十二生肖的设计思想和中国古代专营占星、堪舆、卜筮等方术的历术有关,而其中的十二种动物则很有可能是从《周易》中所采纳并发展演变而来的^⑤。

其二:源自古代的星象学。郑文光先生的《中国天文学渊源》一书论及,十二生肖应来自十二支,有天上的星命为证。

其三:源自原始的图腾崇拜。詹鄞鑫先生的《神灵与祭祀》第三节《十二生肖》中认为,十二生肖源于上古人对十二辰的崇拜,以十二兽作为十二辰或十二月的神的代表^⑥。张蕴先生在《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一文中也赞同此观点^⑦。另外,支持这种看法的还有刘尧汉先生。他在《“十二兽”历法起源与原始的图腾崇拜》一文也指出,生肖产生的原因是出于原始的图腾崇拜^⑧。而张蕴先生更认为,这种原始的崇拜在后来的文明推进中被道教接纳并结合在其中,十二兽便演变为十二神^⑨。

其四:源出于天文。李零先生的《十二生肖的起源》中提出,十二生肖其源出于天文。他指出,萧吉

的《五行大义》卷五《论三十六禽》中有所谓“其十二属,并是斗星之气,散而为人命,系于北斗,是故用以为属。春秋运斗枢曰:‘枢星散为龙、马,璇(璇)星散为虎……摇光散为猴、猿。’此等皆上应天星,下属年命也。”由此不难看出,十二生肖用来推测年命,是一种与西方占星术类似的占卜。十二生肖不仅和生日有关,还与由生日而定的私名有关^⑩。

其五:由奇禽异兽演变而来。其用意是压胜、驱邪。此观点是1978年东京大学教授西嶋定生先生在其文章《中国·朝鲜·日本しこおしなる十二支相の变迁しこいて》中提出的。

(载《古代东亚史论集》下卷)^⑪。

以上几种观点各执说辞,笔者认为最早的十二生肖应产生于中国古代占星家的阴阳历术之学,应属于中国古代思想体系。这种观点是林梅村先生在其《十二生肖源流考》中提出的。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中有关十二生肖的最早资料可追溯至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发掘清理出的《日书·甲种·盗者篇》(图十)^⑫。该墓埋葬时间定为战国末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前后。另外,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日书·甲种·盗者篇》中也有关于十二禽的记载,该书的年代为战国末至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约三十年间^⑬。

这两种书的记载均是用十二地支配以十二禽来破解盗案,并为破案提供线索依据的书面文字。由此可见,十二生肖最早是用于推测当日所发盗案中盗墓者的容貌特征、藏匿方位以及名讳范围,用于协助识破盗案的。李零先生在《十二生肖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十二生肖在此是用来配日,与记日干支的十二支相配,用以标志生日,和取名直接有关。另外,生肖不仅和生日有关,还与由生日而定的私名有关^⑭。这正是古代的占星、堪舆与卜筮之术。到后来十二辰开始置于墓圻中,并按照顺时针为序排列,以子午线为中轴线,足以见其与占星堪舆之术的关系密不可分。

(二) 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

目前以发掘的墓葬中出土的生肖俑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均按照顺时针顺序跟进。这表现出了明确的时空循环往复的含义。一般认为,墓葬中的生肖形

象与堪舆之术不无关系,它主要是用来表示方位、记载年月的,旨在用十二神轮流守护墓主人,求其平安吉祥,并为其驱邪辟凶。十二生肖往往和四神图案一起出现,其含义之一为装饰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表示方位和记载岁月。与四神相比,十二生肖表示的方位更加精确,它在四个大方位的前提下又细分为十二个小方向,每个生肖都是一方标志。

以往的学者们多认为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主要用于压胜、驱邪,这种看法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考虑到墓葬中已经普遍设置有压胜辟邪的镇墓兽和镇墓俑,成系列的十二生肖应该具有较为专门的作用。如果将它和通常同时出现的四神的对应关系考虑进来,其主要作用应当是体现了一种岁月轮回,时光流转之意。

自南北朝起,十二生肖逐渐更多的与年相配用以标志生年,推算年岁。《周书·晋荡公护传》中提及“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同一时期,十二生肖俑亦开始进入丧葬领域,成为随葬品和墓葬装饰之一。

十二生肖的起源虽然是众说纷纭,但其制作成俑在南北朝就已经有了。中原地区成形的俑在唐开元之前十分少见,难以反映其演变规律。隋代南方地区青瓷十二生肖俑时有所见。两湖地区隋唐墓葬中出土的十二生肖俑是比较常见的,其演变序列比较清楚。从隋朝开始,生肖俑往往置于墓室四周的壁龛之中,制作甚精致。唐初承隋,仍是兽首,着宽袖大袍,手持笏板,盘膝坐于底板上。同时,戴冠、着宽袖大袍跏趺坐、手捧生肖的俑也有出土。大致在唐高、武时期已出现站立的盖冠手抱生肖俑或兽首着宽袖大袍的十二生肖俑,并逐渐取代了坐姿俑。

(三) 人形生肖俑源于南方的原因

我们知道,最初的生肖俑是以动物形态出现的,只是到了隋唐时期,生肖俑的造型才和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具体来说,当时的生肖俑从早期的写实动物形态变成了兽首人身,或者是人物手抱、头顶生肖的造型。我们暂且先将这类生肖俑称做人形生肖俑。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人形生肖俑最早出现在南方,它是南方两湖一带,尤其是初唐时期极具地方特色的俑类,是在墓中与镇墓兽同样用作“压胜”或“辟邪”的。一般认为,人形生肖俑的发展是由南方而后影响到北方的。秦浩先生在《南方唐墓的形制与随葬品》一文中提到,在墓中放置生肖俑,中原地区到目前为止的调查中到唐永徽(650年~655年)以后才有出现,南方则最晚自隋以后就比

较普遍了,而且在各时期的演变规律比较清晰^⑨。从目前出土的生肖俑的年代与分布区域来看,的确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肖俑是由南方最早产生的。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人形生肖俑的出现和繁盛,在隋唐时期的南方表现的特别突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阴阳五行的哲学原因,又与当时的历史思想背景以及地区性的思想文化等因素有关。

首先,从阴阳五行的哲学原因来看。

表面上看,十二生肖只是古人为了便于纪年,或者说是为了便于记住自己出生年份而构想出来的十二种对应动物。然而,从其深层含义剖析,远非如此简单,其中神秘化意味及其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十二生肖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对的,而从古人的纪年方法来说,学者一般都认为从东汉元和二年(85年),官方正式采用了干支纪年历法。干支纪年的产生与流传,本来显示出的是古人对时间观念,如日月运行、昼夜消长等认识的程度逐步深化的过程,但却偏要附上与时间概念本不相干的十二生肖,使时间硬配上具体形象的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十二种动物,这说明什么呢?

只是本无甚意义,古人但取纪年而已吗?笔者以为实际上应该蕴涵着特定的意义。这一意义在于古人当时是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所包含的“天人同类”的思维方式,把十二种动物与人的出生年份对应在一起,使时间赋有了与人相类似的灵性。按古人思维的逻辑,如果把动物与人相对应,而人又与天象是相感应的,那么,十二生肖与代表时间之一的干支纪年也就可以互相感应了。这种以“人”作为中介,使天象与动物间可以产生沟通或感应的神秘感的逻辑席位,与阴阳五行学说的神秘化倾向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要说有区别的话,那也只是范畴的大小方面——阴阳五行学说代表的是古人总体思维定势,而人形生肖俑现象反映的则是这种总提思维定势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折射。

其次,从当时的历史思想背景来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人与动物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认为与动物有着血缘关系,因此,对它们的崇拜,胜过了对人自己。自古至今,人们对动物形象的描绘与刻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人形生肖俑的出现便是中国传统丧葬以及美术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它反映出人们热情饱满的创作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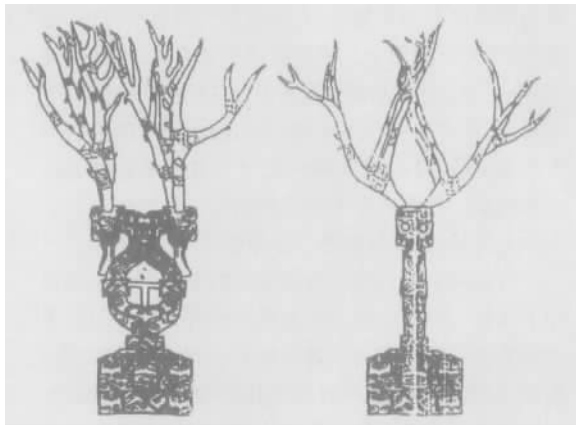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道教的发展进

程中,十二生肖中十二种动物逐步被人格化。因此,我们在谈到十二生肖时不能脱离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十二”是一个成数。《左传·哀公七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周礼·春官·冯相氏》曰:“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可见“十二”是与中国人观天文,制历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十二”是“天之大数”。中国有地分九州之说,但是古人为了天地相应,便又制造出十二洲之说。《尚书·舜典》:“肇十有二洲,封十有二山,浚川。”可见“十二”做为成数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此后,“十二”在道教文化中也成了重要内容。

十二地支是一组与“十二”有关的中国极为古老的时间概念。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结合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最深处,这注定了生肖的被神化人化。前面已经提到,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盗者》以及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亡盗》,都发现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配的名单。其中十二月神的形象最早出现在被考古界定为楚帛书的近于正方形的十二月神图。帛书十二月名与《尔雅》所记月名可相互考释,每面画三个神物,多作身首肢体拼合形状。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篇》曰“以四兽验之,十二辰之禽效之”。十二辰之禽即指十二生肖。大概在此时,阴阳术数家们便把十二生肖与人生肖联系了起来,此风盛于南北朝时。南朝人沈炯曾写过一首《十二属》,即说十二生肖之诗。隋唐时,道教大兴其道,十二支已经完全人格神化,并被吸入道教神系。十二生肖并被制作生肖俑为死者陪葬。唐代《事始》:“黄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生肖属之。”韩愈《毛颖传》:“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可见其风以深入社会。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南方两湖一带的地区性的思想文化。

南方地区的两湖一带属于楚文化的范围之内。由于较少建立在宗族礼法制度之上的理性束缚,楚人的想象远较北方民族自由浪漫,又由于重视人与神的情感沟通,楚地巫风盛行,楚俗“信巫鬼,重淫祀”,神话传说异常丰富。丧葬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总是强烈地反映着一个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因此,春秋战国的楚墓已经多见漆木镇墓兽。它是楚文化中最富神秘意味的雕刻品^①。李学勤先生提出,这种镇墓兽是楚墓特有的,



图十一 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镇墓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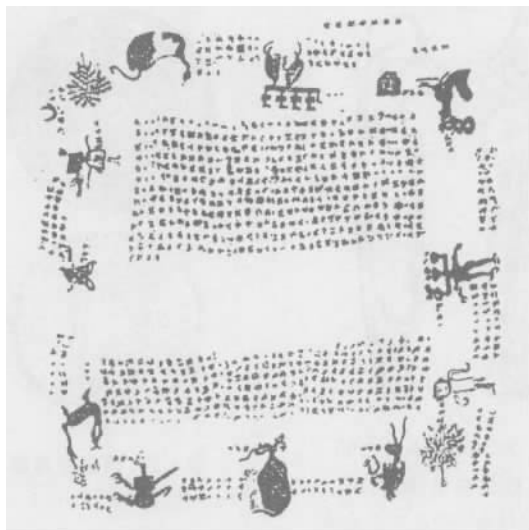
(引用王子今:《中国盗墓史》图二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

充分表现了楚国漆器艺术的传统风格”^②(图十一)。彭浩先生认为镇墓兽应为龙的形象^③。关于镇墓兽的作用虽然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是它却充分体现了楚文化中神秘的巫文化色彩,这一点毋庸置疑。

人形生肖俑的出现,便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尤其是隋唐时期,象征宇宙时空的生肖俑明显多了起来,更加直接的体现了时人视死如视生的意图。不仅包含了天、地、人合一的理念,而且表现其特有的天文宇宙的模式。在发现南方地区随葬陶俑的隋至初唐的墓葬中,生肖俑是最为常见的随葬品之一。此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均可随葬十二生肖俑。只是所随葬的十二生肖俑往往有严格的尺寸大小的等级规定。例如《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记录:“天子园陵用盟器神煞法器……十二元辰本相。长三尺,合三才”;“夫人以下至庶人墓中明器……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

另外,楚地流行四时四方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视觉方式体现可见于1942年9月在旧湖南长沙城东郊出土的“子弹库楚帛书”上的画面描绘。该帛书描绘出十二个神灵像头朝里,足向外在文字四周旋转状布置,四角有青、赤、白、黑四株植物(图十二、图十三)。1960年李学勤先生首先论定帛书边文的十二月名即《尔雅·释天》的十二月名,可能是战国时代数术性质的佚书^④。李零先生的《中国方术考》也指出,帛书讲的是十二神的各月忌宜,顺序是按正月到十二月排列,帛书十二神的“转位”表示十二月的循环^⑤。

虽然这十二个神灵像是楚人凭借大胆的艺术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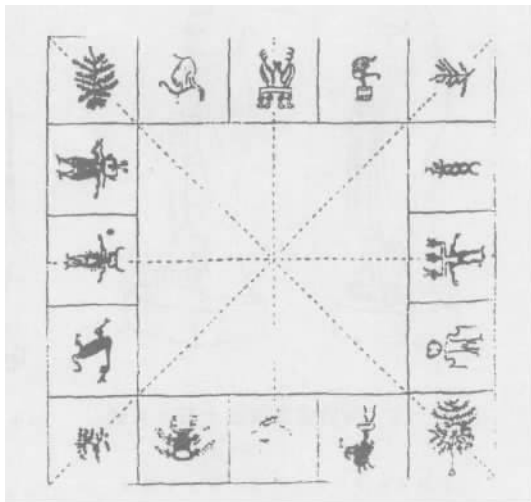


图十二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摹本

(引用李零:《中国方术考》图十, 东方出版社, 2000年。)

象力赋予神灵以形象的代表, 并非日后我们所见到的十二生肖, 但就其性质以及所代表的十二月的循环思想来说, 可以视其为十二神的雏形。可见, 楚地是这种神灵思想的发源地。

由于普遍存在着“视死如视生”的灵魂不灭思想, 面对阴间世界的各种神灵鬼怪, 古人一面力图求得吉利, 得到神灵的庇护, 使死者灵魂得以早升天界; 另一方面, 也要对地下的恶怪加以镇压避凶, 所以在墓葬中才会出现“压胜”“辟邪”的内容^⑥。徐苹芳先生在《唐宋墓藏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库陵秘器葬经》札记》中曾论及, 唐代的墓葬形制与埋葬习俗, 在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当时的堪舆家所规定的制度来安排的, 特别是葬式、随葬品等明器方面与堪舆术的关系很密切^⑦。堪舆即古代的“风水”之术, 其名早见于《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 聚会占家问之, 某日可娶妇乎? 五行家曰可, 堪舆家曰不可……。”堪舆之术在汉时已有, 晋以后此风大兴。到了隋唐, 相墓之术者增多, 帝王尤信, 庶人百姓亦趋仿效。地下世界是地上世界的缩影, 墓葬也往往是地上宫室的变形。隋唐时期的都城与宫殿的位置选择与建造思想都离不开风水堪舆之术。既然地上的建筑与堪舆关系密切, 那么在墓葬中也应如此。生肖俑在墓室中的出现与兴盛恰好体现了这一点。张蕴先生认为, 墓葬中的生肖形象与堪舆之术不无关系。它主要是用来表示方位、记载年月的, 体现了一种岁月轮回, 时光流转之意^⑧。旨在用十二神轮流守护墓主人, 求其平安吉祥, 并



图十三 李零教授绘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图像

(引用李零:《中国方术考》图十一, 东方出版社, 2000年。)

为其驱邪辟凶。

五. 余 论

隋唐时期, 由于域内的大一统, 南方地区与中原的交流繁密, 到了唐高宗永徽(650年~655年)年后, 中原地区也开始出现墓中放置十二辰俑之俗。生肖俑的兴起与道教不无关系。作为我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中有神仙、方术的思想意识, 认为十二生肖乃斗星之气, 散而为人之命, 主管人生辰岁月, 时光轮回, 故十二神虽身仙界, 所尽职责却是人间俗事。李唐王朝为了提高自身的身份地位, 自诩为道家先师李耳的后人, 大兴道教, 这样一来, 便为生肖俑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唐会要》中便有将“四神十二时”置于墓中为明器的明确记载^⑨。这里的“十二时”就是十二生肖。到了周武时期, 武则天更是“铸铜为九州鼎及十二神”^⑩。

古人以十二生肖置于墓中。最初只有纪星、纪时之功用, 后来渐成为永享富贵的一种愿望。十二生肖指代十二时, 有生肖相护, 墓主人便时时可以保持自己的所得。在墓中放置生肖俑虽然在唐开元(713年~741年)之前的北方墓中十分少见, 但到唐天宝(742年~755年)年后就开始盛行。1974年, 在唐肃宗建陵内城门外相继出土2件兽首人身石生肖俑, 均以灰白色石灰岩雕凿, 着宽袖袍服, 腰系革带, 足穿高头履, 双手持笏于胸前, 肃穆站立于方形基座上, 该2件俑出土距离相距千余米, 是目前发现的唐代帝陵内城门外放置生肖俑的首例, 也是北方发现



图十四 唐肃宗建陵出土石生肖俑

1. 马俑 2. 猴俑

(引用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生肖俑》,《文物》2003年第1期)



图十五 李景由墓中出土的铁生肖俑(猪俑)

(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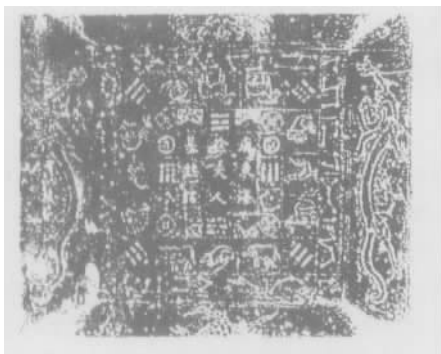


图十六 隋唐生肖像

1. 陕西永寿孟村出土

2. 孔祥星、刘一曼书插图

(引用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图五六,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图十七 江苏南通南唐徐氏墓志盖

(引用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图一零七,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持笏生肖俑的最早一例(图十四)^①。另外,在河南偃师开元26年(738年)的李景由墓中还出土过铁制十二生肖俑,这是十分少见的(图十五)^②。

此外,生肖形象不仅局限于随葬镇墓俑类,还经常出现在墓葬“四刹”上、壁画以及铜镜等物之上(图十六)。十二生肖虽然最早见于《论衡·物势篇》之中,但仅仅是文字而未见实物形象。北齐娄睿墓壁画上的十二支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形象,画中十二支像与星象、雷公、电母相配合。这一发现,打破了认为早期十二支像只刻在墓志石边侧的旧说^③。到了东魏、北齐时,壁画数量增多,十二属相图属护卫驱邪类,常绘于墓室四壁。生肖形象还常在墓志上出现,尤其是南北朝初期出现的方形墓志以及北朝以后的方形带盖墓志,注重刻画纹饰,并日趋繁缛^④。江苏南通出土的南唐徐氏墓志盖上就有十二属相神、二十八宿和阴阳八卦等物(图十七)^⑤。而作为随葬明器

的生肖俑则属于镇墓俑类^⑥。

张蕴先生认为,生肖俑的兴衰与宗教有关。隋至唐初,尽管佛教传入已久,但在丧葬领域内仍以传统的道家思想意识形态居主流,生肖形象的兴盛就是道家思想的反映。然而随着佛教的逐渐深入和蓬勃发展,加上许多外来宗教的涌入以及李唐王朝的衰亡,道教的领导地位便逐渐被佛教取代,因此,生肖俑也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① 《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

②、⑪、⑭、⑯ 秦浩:《南方唐墓的形制与随葬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③、③⑥、⑤③ 史树青:《笔谈太原北齐娄睿墓》,《文物》1983年第10期。

④ 王上海:《中国文化大典》(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⑤ 王充:《论衡》卷3,《物势第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⑥ 《唐会要》卷三十八葬条。

⑦ 《宋史》卷一百二十二。

⑧、④⑨ 王援朝:《王建墓十二武士辩——兼谈十二神》,《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

⑩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⑩ 霍巍:《大礼安魂——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华夏文明探秘丛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⑪、⑫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墓出土文物》,《文物》1957年第12期。

⑬、⑭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第12期。

⑮、⑯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⑰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⑱ 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汉市郊周家大湾241号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⑲、⑳ 熊传新:《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

㉑ 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㉒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

㉓ 顾丞峰:《镇墓兽形制演变析》,《文物天地》1988年第3期。

㉔ 《唐律疏议》卷二十《贼盗律》。

㉕ 盖山林:《乌兰察布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㉖ 蔡鸿生:《突厥年代学中的十二生肖》,《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㉗ 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㉘ 林梅村:《十二生肖源流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

㉙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㉚、㉛、㉜ 张蕴:《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

十二生肖图案》,《唐研究》2002年第8卷。

㉝ 刘尧汉:《“十二兽”历法起源与原始图腾崇拜》,《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1980年。

㉞、㉟、㊱ 李零:《十二生肖的起源》,《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

㊲ 于豪亮:《秦简 日书 记时记月诸问题》,《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

㊳ 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 日书 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㊴ 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

㊵、㊶、㊷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㊸ 彭浩:《“镇墓兽”新辩》,《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

㊹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 大汉库陵秘器葬经 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㊺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

㊻ 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生肖俑》,《文物》2003年第1期。

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㊽、㊾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第112页)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民国十九年(1930年)司法部刊行

① 《西江政要》道光四年王雅南“议南康县民间卖田多书退约不立卖契,冀免投税”。

② 《东方杂志》(宗教)1908年第2期。

③ 熊漱冰:《十年来江西之地政》,《赣政十年》,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编印。

④ 何海晏:《平均地权与土地法》,《社会科学月刊》第1卷创刊号,1939年8、9月。转引自《民国法学论文精萃》(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⑤ 下文幅面参数均为约数。

⑥、⑦ 田涛、宋格文、郑秦主编:《田藏契约文书

粹编》(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见《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上册。

⑧ 如王铁雄:《域外古代产权制度比较研究——从服务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与利用制度变迁之角度》,《法律文化史研究》(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着眼于罗马法的永租权与中国的永佃权的比较;作中国法制史研究则非常多。

⑨ 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科教授寺田浩明:《中国契约史与西方契约史——契约概念比较史的重新探讨》,谢晖等主编《民间法》(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周广明)